

殖民視覺暴力與文化清洗見證： 日治初期臺灣原住民電影活動的初體驗

劉現成*

摘要

過去討論日治初期臺灣電影史，鮮少論及原住民的電影經驗。本研究從電影吸引力、電影戰爭認知後勤的角色及文化清洗的觀點，運用史學方法，重探日治初期臺灣原住民的電影經驗。分從一是觀光體驗電影驚奇，影像夾帶文明化與武器奇觀，電影成爲清洗原住民文化工具；二是隨軍參與鎮壓的電影攝影機，見證了殖民者的暴力，更是帝國擴張種族鎮壓的武器。最後，原住民電影經驗體現出對南部鄒族施以綏撫措施，對北部泰雅族則施以征伐手段。

關鍵詞：文化清洗、原住民電影、電影史學、電影吸引力、認知後勤

投稿日期：2022.04.14 通過日期：2022.12.19

感謝論文撰寫期間，提供研究相關協助的人們，以及在學刊審查過程中審查者極具啓發性與建設性的修改建議。

* 劉現成 崑山科技大學視訊傳播設計系暨媒體藝術研究所副教授 brutusliu@gmail.com

Visual Violence of Colony and Witnesses to Cultural Genocide: Retracing Cinema Experienc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in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Hsien-Cheng Liu*

Abstract

In colonial times, cinema is a vital tool to promote government orthodoxy and to preserve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governed. The present study considered cinema's attractive qualities and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in the process of documenting and perpetuating the cultural genocide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rough film. This study used a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 to generaliz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cinema viewing experienc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in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Furthermore, this study focused on two historical dimensions. The first dimension considers film viewing as a virtual tourism activity driven by the colonizers; films became the tools of the colonists' cultural expansion. The other dimension concerns images of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army cameras entered the territory of indigenous peoples like a weapon, recording brutal battles and witnessing the colonists' violence. Finally, the indigenous film experiences reflected the colonizers' policy of appeasement of the Tsou people in the south of Taiwan and subjugation of the Atayal people in the north.

Keywords: Cultural Genocide, Indigenous Cinema, Film Historiography, Cinema of Attraction,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 **Hsien-Cheng Liu**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Motion Pictures and Video and Graduate School of Media Arts, Kun Shan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brutusliu@gmail.com.

壹、前言

過去在日治時代臺灣電影史的研究中，大多關注電影進到臺灣的時機、商業電影映演機制的建立、以及當時在臺灣的漢人參與或觀賞電影活動，卻很少討論到當時臺灣原住民與這項新媒體的接觸、互動與體驗紀錄。然而，根據《臺灣總督府檔案》資料指出，臺灣總督府在1900年8、9月期間曾指派阿里山鄒族原住民的學生阿巴里（アバリ）到日本觀光參訪，¹在日本旅行期間安排各種官方的見學行程，其中最令這位學生愉悅懷念的事蹟，卻是在仙台參訪時所安排的活動寫真（即電影，日文漢字的舊稱，以下同）的觀賞活動（臺灣總督府，1901年1月1日）。

這份文獻的出現，不僅提出了在二十世紀之初，電影傳入臺灣前後，臺灣原住民已在殖民政府刻意安排下，見識到電影的魅力了，是否還有其他原住民有同樣的經歷？而臺灣原住民在此刻已經接觸到電影這項新媒體，那日治時期原住民的電影經驗又是如何？特別是日本殖民政府對原住民另眼相待，在統治需求下，電影如何成爲殖民政府積極運用於政宣與教化原住民的機制。以上這些問題，過去臺灣電影史相關論述中雖然常常被提及，但是討論到原住民對電影的體驗總是伴隨著日人或漢人的電影開發經驗而生，至今仍無一個獨立而完整的歷史論述。因此，本研究即試圖透過歷史研究，檢視從1895年日本殖民臺灣爲始，到1915年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卸任爲止，這段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最初的二十年間，統治者對待原住民的態度，從最初的懷柔手段，到後期以強烈的軍事手段來鎮壓原住民，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當時臺灣原住民是如何接觸到電影這項新媒體？他們的觀影經驗又是如何？當時殖民政府如何將電影運用於原住民的治理，而這些不只是原住民最初的電影體驗，更是臺灣人亟待建立的電影文化經驗。

貳、文獻、概念與方法

過去討論日治時代原住民電影的相關文獻中，大多聚焦在少數以原住民為題材的劇情電影，如《義人吳鳳》（1932）與《沙鶯之鐘》（サヨンの鐘，1943）等影片，關注的焦點圍繞在影片中對於原住民形象與生活方式的再現問題，以及國家如何透過武力與剝削的過程來文明馴化原住民的議題（吳其諺，1993，頁 52）。而其中尤以《沙鶯之鐘》受到最多討論的，從 1938 年一個宜蘭原住民少女落水事件，受到殖民政府高度包裝與操作（周窈窕，2003，頁 13-31），1943 年改編這個故事成為電影，殖民政府透過影片的傳播力量，從宗教、社群關係、語言與歷史等面向摧毀並重構原住民的社會，使他們成為日本帝國的子民，進一步成為其向亞洲擴張的勁旅（羅頗誠，1994，頁 44-47）。因此，過去討論日治時代原住民的電影時，都侷限在這些少數被製作出來的電影，分析面向亦侷限於原住民的形象與文化的再現，而這些僅是日治時代與原住民相關電影文化的一部分，亟需以更多的面向、更寬廣的歷史視野來探究日治時代原住民的電影經驗。

在日本統治之下，臺灣發展出映演獨盛製片蒼白的殖民地式電影體系（李天鐸，1997，頁 43）。回顧過去臺灣日治時代電影史的文獻，一般所關注的多從電影的娛樂功能與戲院的發展來討論日治時代的電影事業發展，這樣的取向大多從電影傳入臺灣、常設戲院的肇建與形成、日人與漢人所建立的電影製片活動（市川彩，1941／李亨文譯，1993；呂訴上，1961；李道明，1995；黃仁、王唯編，2004；葉龍彥，1998；厲復平，2017；Hong, 2011／何曉芙譯，2018）。然而，對於臺灣來說，電影從一個新發明到後來發展成為一項娛樂產業，其實是歷經一段漫長的發展過程，特別是在當時作為殖民地的臺灣，如果從電影娛樂功能角度來看，這個新式的娛樂最先服務的是當時在臺灣的日本人，其次才是在臺灣最多的族群——漢人。至於，當時臺灣原住民是如何與這個視覺媒體開始接觸與互動，若單從娛樂功能面向是無法窺探原住民電影活動的全貌與本質。

在過去研究中，已有不少關注到日治時代原住民的電影經驗問題。如在葉龍彥的書中，曾提到日治時代殖民政府將電影作為政宣的工具，

其中對原住民的電影教育，更是積極（葉龍彥，1998，頁 34），但是文中對於原住民的電影教育並未加以深究。在三澤真美惠《殖民地下的銀幕》一書中，對於殖民政府統制電影的方式，雖有更為詳細的描繪，但是對於原住民的電影經驗，僅有〈成爲「理蕃」²事業的電影利用——從「威嚇」到「皇民化」〉一節，內文以案例方式呈現殖民政府從 1925 年到 1943 年運用電影來治理原住民的形式（三澤真美惠，2002，頁 205-212），不僅忽略了在此之前原住民相關的電影活動，亦簡化了殖民政府運用電影作爲原住民統治與教化工具的策略與圖謀。

在李道明相關研究中，持續關注日治時代原住民的電影發展，過去即曾提出，日治時代臺灣電影的發展與殖民政府有密切的關係，將電影作爲教化原住民的形式，更與總督府「理蕃」的觀光政策並用而行（李道明，1994，頁 55-57，2000，頁 54-58）。晚近，更在其〈教化、宣傳與建立臺灣意象：1937 年以前日本殖民地政府電影運用分析〉一文中，對於日治時期殖民政府運用電影對原住民進行教化與統治的歷程，有了更爲清晰完整的輪廓（李道明，2019，頁 201-277）。然而，上述的研究多以電影爲本體的論述，而未從殖民政府的原住民統治政策的角度，來加以檢視電影在殖民地所肩負的政治任務，並審視其所扮演的原住民規訓與教化的功能與角色，以至於無法綜觀電影在殖民政府遂行原住民統治的歷史全貌。因此，本研究試圖以更聚焦的方式，探究日治初期（1895 到 1915 年），特別是從殖民開始到佐久間左馬太鎮壓原住民軍事行動終結爲止，在這段臺灣原住民遭受到形同種族滅絕的激烈統治手段時期，電影如何遂行殖民者的統治目的，原住民如何參與這些相關的電影活動，藉以重新勾勒日治初期臺灣電影的文化經驗。

此研究是針對日治初期臺灣電影的研究，此時電影剛問世之際，電影史學者湯姆·甘寧（Tom Gunning）指出，雖然現今劇情片當道，但是再重新探究早期電影發展之時，必須特別關注這項媒體其電影吸引力（the cinema of attraction）的特質。電影發明之初，運用令人興奮的奇觀，無關乎事件是虛構抑或紀實，只要本身有趣，能夠激起視覺好奇與提供快感，即可直接招徠觀衆的注意力（Gunning, 2006, p. 384）。電影這種直接訴諸奇觀與視覺快感的特性，如果與戰爭結合的話，則可能更加蠱惑人心。保羅·維利里奧（Paul Virilio）在《戰爭與

電影：認知後勤學》(War and Cinema: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一書提到：戰爭的歷史，是認知場域激進變遷的歷史，當電影可以創造科技與心理驚奇效果之際，其實與戰場上的軍火武器無異 (Virilio, 1984/1989, p. 10)。所以一旦電影與戰爭構聯，運用其創造視覺奇觀的吸引力，成為摧毀敵人心智、建構認知後勤作戰的利器。而從過去殖民帝國的擴張開始，到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乃至到近代戰爭，電影作為一種認知後勤系統與戰爭息息相關，一方面軍事偵察科技讓電影技術有更創造性的運用；另一方面是戰爭、視覺奇觀與電影宣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Pisters, 2010, pp. 233-234)。

電影運用奇觀與宣傳建構了對戰爭認知的魔幻效果。電影是西方科學發明的產物，在其發展初期已經承襲種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話語，透過電影讓觀眾體驗到「西方文明進步」的主流敘事，也讓「他者」的世界變得垂手可得 (Shohat & Stam, 1994, p. 92)。對殖民者來說，電影本身深具文明化的潛力，是將原住民從無法統治的野蠻人轉變成現代殖民對象之社會轉型的工具 (Griffiths, 2002, p. 234)。更進一步來說，電影已不是單純的媒體形式，而是轉身成為殖民者對原住民進行文化清洗 (cultural genocide) 的手段。文化清洗是支配者有意削弱或摧毀抵抗團體的文化價值觀，以令其畏懼的作為。最終的目的即是要消滅這個團體與文化 (Davidson, 2012, pp. 18-19)。這對嚮往「脫亞入歐」的日本帝國及其轄下的臺灣總督府，深信在所有現代科技中，電影是將臺灣原住民轉變為受過良好教育的日本帝國臣民最為有效的媒體 (Baskett, 2008, p. 16)。電影在日本殖民的統治中，扮演著文明化與教育的功能，而這些舉措其實都是文化清洗的過程。因此，本研究試圖從電影發展初期的吸引力特質，電影作為殖民擴張戰爭中扮演認知後勤作戰的角色，以及殖民地政府對原住民進行文化清洗的角度，重新探究日治初期臺灣原住民的電影文化經驗。

本研究所採行的研究方法是歷史研究法，這是藉由相關歷史文獻的收集與彙整之後，對以前曾經發生的社會事件或現象進行分析的研究方法。這樣研究方法是以前歷史資料為基礎，歷史資料是「考察成為歷史對象之人類社會之往日狀態及其變遷的依據」(鄭樑生編，2002，頁 45)。而根據史料的價值與可信度來分類，分為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直接史料是與歷史事件有直接關係的史料，當時被記錄下來或是

事件自身遺留下來的資料。而間接史料則是非直接、經轉述的歷史資料（杜維運，1997，頁 138-141）。因此，歷史資料的來源關乎歷史的書寫與事實的建構。

本研究探索的是日治初期原住民的電影活動，這與當時殖民政府所施行的原住民統治活動有密切關係，這是過去探究日治時代電影歷史的論述中，鮮少觸及的文獻與資料面向。因此，在史料的來源上，分為以下四個層次：首先是殖民政府的官方文獻，包括從總督府到地方州廳政府原住民統治的相關檔案與資料，如《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或歷年統治紀事，如《臺灣事情》，或原住民的統治紀事，如《理蕃概況》、《理蕃誌稿》、《臺北州理蕃誌》等等；其次是日治時代報刊雜誌有關原住民電影活動之轉載：包括以一般大眾為對象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警察時報》、《臺灣時報》、《臺灣婦人會》等關於原住民電影活動的訊息；另外，以原住民治理目的所發行的《蕃人界》、《理蕃之友》等期刊，進一步檢視過去原住民參與官方電影活動的相關紀錄；最後是，從過去日治時代臺灣電影發展與歷史研究中，重新梳理與原住民電影活動的相關文獻與紀錄，藉以深化臺灣電影研究中關於原住民的論述。

參、殖民地原住民的觀光活動與電影經驗

根據現有文獻指出，在 1899 年 9 月臺灣已有電影放映紀錄（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9 月 8 日；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9 月 9 日）。至於，原住民的電影經驗從何開始？文前即已指出，鄒族的青年阿巴里在 1900 年 8 月由殖民政府安排觀光到日本見學，在仙台停留期間即已觀賞過電影。為何這位鄒族青年會被安排到日本觀光？這需追溯到 1899 年元月當時嘉義辨務署為原住民實施簡易教育，召集轄內鄒族三位年輕人，住於署內，供其衣食，學習日本生活，日文單字、會話與算術。這三位年輕人，分別為阿巴里、宇旺（ウオン [Uon]），另譯吳雍，智母勝社人，今稱特富野，位於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八至十

鄰一帶)及巴斯拉(バサラ [Basura]，達邦社，位於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一至五鄰一帶)(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頁273／陳金田譯，1997，頁219)。

這一趟上京之旅，由當時主管原住民事務的辨務署轄下第三課長石田常平策畫，在1900年7月12日由臺南安平出發，搭船至澎湖，經基隆到臺北參觀，7月25日再由基隆出發前往日本，29日抵達神戶，沿途參觀大阪、名古屋、東京、仙臺、京都、馬關等地名勝、學校、軍事設施(臺灣總督府，1901年1月1日)。在當時《臺灣協會會報》曾刊登這則消息：

臺灣生蕃。名阿巴里者。隨伴嘉義辨務署第三課長。石田常平君。來到內地。現在遊觀各處。該蕃人。斬頭髮。穿白色洋服。故此一見與內地人無異。況且會得日本語。將來頗有望云(臺灣協會會報，1900年8月20日，頁69)。

在8月10日到9月9日於仙台的行程中，特別安排觀賞了有關美西戰爭的活動寫真(電影)。在當時總督府留存的《觀光日誌》中，隨行官員特別記下阿巴里觀看活動寫真的心得：

阿巴里先在上野公園看過有關會津戰爭的環景畫(パノラマ)，後來在仙臺看了電影感覺很開心。此影片是以美西戰爭為題材的動作片，銀幕上播放著很逼真的軍隊活動，好像身在戰場中，可以感受到馬匹奔馳的樣子、部隊開炮的場面、救護部隊收容傷兵及佔領砲臺的光景，都猶如親身目睹真實的戰況。阿巴里看完後感覺非常愉快，這可能是這次旅行中最好看的事物(臺灣總督府，1901年1月1日)。

阿巴里這段上京見識的觀光之行，在當年7月19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上，即出現報導(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7月19日)。回臺之後，更在11月中旬集合阿里山各社61位原住民，進行集會演講分享的觀光經驗(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1月16日)。而在年底更報導了阿巴里在旅途期間觀看電影的體驗(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2月28日)。如此由官方舉辦的原住民觀光活動，在本島與日本透過媒體大肆宣揚，回來安排這些參加者在部落各地進行體驗分享，藉以擴大

觀光旅遊的見識在部落間的影響。此後，殖民政府安排原住民赴日觀光之時，大多會安排觀看電影的行程，透過這些活動影像，讓原住民看世界的發展、日本的進步與都會景觀。

然而，阿巴里在這段長達將近二個月的觀光旅程中，日本人大費周章地安排關於軍事、教育、工業與農業等四個面向的發展，讓這位原住民青年見識到日本的文明開化程度，但是對他個人來說，整個旅程混合著暈車船、發燒與離家思鄉之情（鄭政誠，2005，頁 237-245），觀賞電影成爲此趟行程中最爲愉悅的活動。可是仔細審視日本人安排給他觀賞的電影，是與當時戰爭與現代軍事相關的題材，在影像的觀覽上雖饒富趣味，但是卻別有用心，懷有威嚇之意。阿巴里是第一批接受日本簡易教育，受到上京觀光的待遇，見識到像電影這些新事物的臺灣原住民青年。1901 年阿巴里迎接第一批進入阿里山鄒族的日軍，曾擔任日警巡查補，參加八通關撫番戰役與大埔土匪的討伐行動，深獲日本人信賴，成爲日本與鄒族間溝通的橋樑（巴蘇亞·博伊哲努，2006，頁 18-23；高英傑，2018，頁 42-46）。

鄒族原住民從阿巴里等三位青年開始接受日本文化，而鄒族更與臺灣電影的發展有極深的淵源。根據《蕃界平定紀念：臺灣開發誌》記載：

明治三十四年（西元 1901 年）高松氏攜著一萬呎的底片到臺灣，獲得當時警視總長大島先生的贊助，帶著五位阿里山原住民作為嚮導，花了七個月時間深入原住民部落並將當地的風情拍攝成電影。之後帶著這五名當嚮導的原住民回來日本，並讓他們去日本各地觀光，並協助說明電影內容的資料，讓電影得到了好評。這使他們成爲第一批去日本觀光的原住民（古川松舟、小林小太郎，1915，頁 12-13）。

在過去的研究中，曾提及高松豐次郎曾經七次來臺，最早的紀錄始於 1901 年，但是在過去文獻中，對於這一年來臺相關行程語焉不詳，這份文件加上過去已有的歷史研究，可以大致勾勒出 1901 年高松豐次郎在臺灣所進行的工作。1901 年 10 月下旬殖民政府沉浸在臺灣神社落成的歡騰中，高松來臺可能與臺灣神社落成的慶典有關。根據市川彩的紀錄，高松豐次郎曾於 1901 年 10 月攜帶包括《英杜戰爭》

等影片來臺灣，11月上旬在西門町臺灣日日新報社前放映影片（市川彩，1941，頁86／李享文譯，1993，頁109）。而《臺灣日日新報》在10月23日新聞中，即報導從24日起，在西門外街放映北清事變（八國聯軍）與英杜戰爭的影片（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0月23日）。而從時間接近程度來看，11月17日在新竹廳北門外竹陽軒所舉辦的「活動幻燈會」（李道明，1995，頁32-33；葉龍彥，1996，頁18；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1月21日；潘國正編，1996，頁27-8），如果當時真為活動寫真的放映活動，這次的放映活動會不會與高松有關？就此推斷，高松豐次郎有可能在11月前後接獲當時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的指示，帶著攝影機與底片，由五位阿里山原住民為嚮導，花了七個月時間，在山區拍攝影片。根據李道明的考據指出，1902年3月25日高松曾向當時臺南廳申請從臺南赴廈門與香港工作的旅券（護照）（李道明，2019，頁251）。後來，高松曾帶著這些原住民到日本協助解說電影內容，成為繼阿巴里之後，第一批到日本解說電影並觀光的原住民。

而在《蕃界平定紀念：臺灣開發誌》一文中提及，高松豐次郎曾獲得當時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的贊助，這與羅維明在〈日治臺灣電影資料出土新況〉一文中所指出是相同的（羅維明，1993，頁121）。而其所依據《臺灣人物誌》關於高松豐次郎的介紹，為文的內容幾乎如出一轍（大園市藏，1916，頁89-90），只是前一本書提早了一年出版。過去的研究，大多認為高松豐次郎能在臺灣可以建立起他的電影事業，皆與曾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及擔任過臺灣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兩者鼎力支持有關（石婉舜，2012，頁38，43；李道明，1995，頁36；葉龍彥，1998，頁64）。然而，若從日治初期臺灣殖民政府的官僚結構與權力的變化來看，亦不能排除大島久滿次對於高松在臺灣開展影劇及相關事業的重要性。

大島久滿次初期在臺因平定漢人抗日有功，於1901年11月接任民政部警察本署警視總長一職，擔任六年的總長職務，當時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為了鎮壓原住民，在1908年更升任他為民政長官，而與後藤新平的舊勢力決裂對立，後來因涉貪汙被迫於1910年下臺，在1912年受任為神奈川縣知事（黃昭堂，1981／黃英哲譯，2013，頁94-95）。高松於臺灣在1907年拍攝總督府委託《臺灣紹介》宣傳影片，1910

年建立起遍布全島的連鎖劇院，1912 年之後更曾二度回家鄉參選議員落選（石婉舜，2010，頁 50），其在臺的生涯歷程與大島在臺灣勢力的起落，有著緊密的重疊程度，加上此際大島是殖民地原住民統治最核心的決策者與執行者。因此，探究高松豐次郎在臺灣的發展，不能忽視大島久滿次在臺任官對其的支持與影響。

1907 年高松豐次郎接受臺灣總督府的委託，拍攝《臺灣紹介》的宣傳片。當時《臺灣日日新報》有極為詳細的報導，影片內容分成五大部分：一是臺北；二是金山與基隆；三是鐵路與地方漫遊；四是「蕃界」；五是討伐「蕃人」，有關原住民的影片內容即佔了二大部份。其中關於「蕃界」部分，拍攝以屈尺、龜山這些山林地區之發電與水利的運用（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5 月 5 日），山中發電，除了開發山林之外，更重要的是爲了架設通電的鐵絲網以防範未歸順原住民的進入。1905 年深坑廳於轄內部份「蕃」地架設通電的鐵絲網，防「蕃」效果顯著，開始了沿著山中的隘勇線架設電網的設施（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徐國章譯，2005，頁 303）。

而在《臺灣紹介》片中，關於討伐「蕃人」部分，根據當時報紙陳述，在影像上最突出的是「討伐」原住民的場面：

警官擬將隘勇線往山中推前，召集烏來社蕃人訓話，蕃人不滿而退席。推前之工作開始，先入森林，伐大樹開路，過危險吊橋，攀岩石；蕃人藏在路旁密林狙擊隘勇；前進隊追擊，射擊戰之後，蕃人進入深山，我軍自山上砲擊蕃社，蕃人四處奔逃，碰鐵絲網觸電。蕃婦家人等悲嘆蕃社沒落，迫勸壯丁歸順，警官探查是否真心後，准許他們繳械，並舉行嚴肅的歸順儀式，然後男女在一起跳舞（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5 月 5 日；葉龍彥，1998，頁 75-76）。

1906 年 4 月佐久間左馬太接任第五任臺灣總督，直到 1915 年 5 月卸任，在位近十年間，積極推動前後二期高壓統治原住民的「理蕃」政策：第一期從 1906 年至 1910 年，以「甘諾」政策（先施以引誘原住民「甘心承諾」在其境內設置隘勇線）爲手段，對北部原住民推進隘勇線，對南部原住民地區設置駐在所，施以撫育措施；第二期從 1910 到 1915 年，以收繳原住民的槍械、推進隘勇線的軍事行動爲主（藤井

志津枝，2001，頁 83-119)。而以上在《臺灣紹介》的影片中，見證了殖民政府動用先進武力與優勢軍警，搶占原住民的生存之地，藉以擴張其政治權力的管轄領域，開發山林產業與經濟利益。高松豐次郎在當年 2 月緊鑼密鼓地拍攝，是爲了趕赴 3 月 20 日在東京開幕的勸業博覽會，展期直到 7 月 31 日，博覽會上臺灣總督府籌辦了「臺灣館」，這部電影在會場放映肩負著回到殖民母國宣傳臺灣治理績效的目的（呂紹理，2011，頁 160-168）。6 月 10 日高松豐次郎更帶領著由漢人 10 人與以鄒族爲主的原住民 5 人，³組成赴日宣達的隊伍，到日本各地巡迴表演、演講並放映電影（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6 月 9 日）。

鄒族在日本殖民臺灣的初期，在 1899 年有三位青年接受簡易日本教育，其中矢多阿巴里在 1900 年得到赴日本觀光的優厚待遇；宇旺在 1902 年 3 月隨警察隊搜索匪徒時而戰死，巴斯拉因家裡有事返回故鄉，後來常爲日人與鄒族間翻譯會話（臺灣總督府警察務局，1918，頁 28／陳金田譯，1997，頁 219），1901 年高松豐次郎到阿里山拍攝影片，目前的文獻史料尚無法得知這三位鄒族的青年是否參與？而在 1907 年參與五位鄒族人中，從年紀、工作性質與拼音上，最接近可能是 1899 年巴斯拉（パスラ [Pasura]），與 1907 年的ムキヤナ、パスヤ（Mukiyano Pasuya），二者是否有關，亟待更多相關史料來加以證明，藉以勾勒出日治初期鄒族電影活動經驗的原貌。

日本殖民政府運用觀光活動來做爲「啓發」與「威嚇」原住民的統治手段（鄭政誠，2005，頁 12；Sand, 2014, p. 30）。遠者，如矢多阿巴里一樣赴日觀光；近者，可以安排原住民於臺灣島內都會地區或大型活動，如博覽會或神社安座或祭典等，並在這些參訪的觀光行程中安排電影觀賞的活動。早在 1905 年 1 月底，苗栗大湖支廳轄下沙英禾社、小南勢社與大南勢社原住民 21 名，在歸順之際，被安排參觀陸軍的演習與觀看電影（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2 月 4 日）。在殖民者爲原住民安排的參訪活動中，刻意安排電影觀賞的行程，於是看電影成爲原住民接受日本教化的重要形式。

1909 年 6 月 4 日至 14 日安排即將歸順的宜蘭南澳地區的原住民赴臺北觀光，當時報紙更刊載他們被安排觀賞高松豐次郎的電影，影片的內容除了當時的東京市容，另外大部分都跟日俄戰爭、閱兵軍容、

征伐原住民之戰況與歸順原住民之舞蹈等相關的影像與場面（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6月13日）。在當時《臺北州理蕃誌》中，留下這些原住民觀看電影的紀錄：

費解！費解！奇怪！銀幕內一定很多人，不然的話，就是神的作為。其中最令人感到愉快的是陸海空的戰爭，令人最不愉快的是，看到蕃人誤觸鐵條網而被電死（臺北州警務部，1923，頁64／莊振榮、莊芳玲譯，2014，頁1396-1397）。

此際，宜蘭南澳的原住民所看到的影片內容，很有可能是由高松豐次郎所拍攝《臺灣紹介》影片中，關於原住民誤觸通電鐵絲網而死的影像。殖民政府透過島內觀光向原住民展示文明進化程度以消解他們反抗的意志，並強制原住民觀看族人被通電的鐵絲網觸電而死的影像場景，成為充滿死亡懲罰與制裁的教化場面（松田京子，2014／周俊宇譯，2019，頁182）。高松豐次郎受總督府委託拍攝這部影片，原來的目的是為了誇示殖民地治理的績效，最後卻成為見證了總督府的殖民暴力。原住民此時所觀賞的電影，包藏著殖民政府威嚇統治的用心，利用當時東京等現代化的都會景觀，來摧毀深居山林的落後，藉以仰望日本殖民下的現代化；運用日俄戰爭、戰備軍容，甚至鎮壓與觸電網而死的影像，來震懾原住民的反抗與不滿，如此建構了日治初期，原住民對於電影最初的體驗，其實電影就是殖民政府進行對原住民文化清洗的無形武器。

觀光活動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攏絡綏撫原住民主要的教化政策，除了臺灣島內觀光之外，更重要的是安排原住民赴日觀光活動。這種深具教化意味的觀光活動，始於1897年，當時特別安排了泰雅族、布農族、鄒族與澤利先族等十三人到日本觀光。根據當時隨行官員觀察的報告指出：

原住民(原譯文)至日本觀光後，驚嘆土地廣大及軍隊強盛，且說絕不與日本戰爭。……，曾經畏懼帝國威力之無知原住民因此次活動確實感激政府之恩澤。(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頁54／陳金田譯，1997，頁47)。

殖民政府咸認為觀光活動可以讓這些原住民離開偏僻的山林，目

睹日本的文明進化與武備軍容，可以對他們造成極大文化衝擊，開始懷疑並鄙視自己的文化，對殖民政府產生欽羨孺慕之情，而對其統治下的現代生活充滿憧憬與懷想，逐漸達到其文化清洗的目的。殖民政府實施的觀光活動對原住民進行洗腦的成效如何，根據松田京子研究指出從 1897 年開始辦理原住民到日本觀光參訪開始，直到 1941 年為止，總共舉辦了二十一次的「內地」觀光（松田京子，2014／周俊宇譯，2019，頁 60）。由此可見，殖民政府認為運用觀光活動來改變原住民的世界觀，成效顯著，這個政策持續執行了四十餘年。

這些被安排到日本觀光的原住民領袖回臺灣之後，像矢多阿巴里一樣，必須到部落跟大家分享在日本所觀覽的經驗，儘管這些觀光者在部落裡描述了在日本觀看到多麼驚異摩登的景象，部落的人民大都半信半疑。在 1908 年警察本署召開第七次原住民事務會議中，恆春廳警務處長便建議，這些曾經參加觀光的原住民，再回部落宣傳時，常因口才不佳無法適當傳達，希望可以提供觀光相關的相片來補足這個缺點（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頁 580／陳金田譯，1997，頁 491）。在 1912 年臺灣總督府分別於 4 月與 10 月安排了二次的原住民赴日觀光活動。而在 4 月的日本觀光行程中，即由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委託日本「エムバデ會社」隨團拍攝的紀實影片（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7 月 26 日），這部影片紀錄著原住民走訪東京、名古屋、京都、大阪與奈良等地重要的軍事設施與名勝，並透過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發行影片，在總督官邸試映，隨後在全臺巡迴放映（大橋捨三郎，1941，頁 139-144／李享文譯，2000，頁 134-139；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7 月 27 日）。

這些觀光紀實影片更重要的是安排到部落給原住民觀賞。1913 年 2 月 7 日到 16 日在宜蘭南澳、溪頭一帶的原住民放映關於內地觀光的影片（〈蕃地の活動寫眞〉，1913 年 3 月 15 日，頁 137）。當時斯打洋（スタヤン，Sutayan）駐在所的宮崎警部補，更詳細刊錄了這些原住民的觀影感想：

除了日前到內地以及臺北觀光的人之外，對於觀光都覺得不可思議，因而沒有人願意相信，經由這一次電影的說明，才相信真有其事，也才瞭解到他們觀光內地時的情況，以及到處

受歡迎的經過是真的。此外，對於照相機的作用，他們在驚歎之餘，直說這是神的所為。他們對於日本堆積如山的槍械彈藥，以及東京市街的宏偉壯麗，大感驚訝。……他們認為電影不是人製造的，完全是神所為，……（臺北州警務部，1923，頁 284／莊振榮、莊芳玲譯，2014，頁 1630）。

這段觀影感想不只記載著當時原住民的赴日觀光活動的確拍攝了一些相關影片的紀錄，更翔實地記載著這樣的觀光經驗，透過電影的投影裝置，轉換成另一個虛擬的觀光者之眼（Griffiths, 2002, p. 75），映照在這些深山部落，讓原住民能就近看到這些世外的「文明」與「進步」，而電影所投射出來觀光者之眼，不是這些原住民作為一個旅者的凝視，而是背後安排這些觀光活動殖民者的帝國之眼，這個殖民帝國將原住民視為一種可以被殖民母國文明改造的客體與統治對象，並仗恃著堆積如山的槍械彈藥與宏偉壯麗的帝都，將自己加以神格化，讓這些原住民懾服膜拜。儘管在官員筆下觀眾們陶醉在這些影像，但是現場仍有人還提醒著大家：「日本製造這些東西，是要來威嚇我們的。」（臺北州警務部，1923，頁 284／莊振榮、莊芳玲譯，2014，頁 1631）因此，原住民對這些殖民者運用電影作為教化手段的統治企圖，其實已經昭然若揭。

殖民政府安排原住民赴日本觀光活動，委託拍攝這些行程的紀實影片，並將這些影片在部落裡巡迴放映，在這一連串的活動中，穿梭在日本人與原住民當中，從事翻譯與意義傳達的通譯即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當時，泰雅族原住民婦女亞越絲·伯列（日文原名：ヤジツベリヤ〔Yayutsu Beriya〕，另譯，中野雅佑子）是當時在原住民觀光與電影製作活動之間進行說明的通譯。亞越絲·伯列，生於 1885 年新竹角板山附近的泰雅族家庭，1900 年與日人中野忠藏結婚，1904 年在臺北艋舺公學校就讀，1910 年畢業後在蕃務本署工作。1911 年入學「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Ziomek, 2015, pp. 130-131；石丸雅邦，2017，頁 59-60）。1911 年即已擔任原住民赴日本觀光團的通譯（竹中信子，1995／曾淑卿譯，2007，頁 37）。10 月工作結束之後，還領到總督府賞與 25 圓的獎金（臺灣總督府，1915 年 9 月 1 日）。1912 年 4 月再度接受總督府的命令擔任原住民赴日觀光團的通譯，除了必

須在原住民與官員之間進行溝通之外，這次觀光活動新增電影製作人員隨團拍攝，所以同時肩負了電影團隊與原住民之間的意見傳達工作。回臺之後，在當年 8 到 10 月之間，絡繹於臺北、臺中、宜蘭等三廳，巡迴部落放映觀光團所製作的宣傳影片，擔任現場翻譯，為那些無法到日本觀光的原住民說明電影內容，總督府後來更賞與 20 圓的獎金以嘉勉其工作（臺灣總督府，1912 年 12 月 1 日；Barclay，2017／堯嘉寧譯，2020，頁 309）。這可能是臺灣最早的電影辯士，解說的不是外來的劇情片，也不是外來新聞紀實片，而是臺灣原住民在 1912 年到日本觀光的旅遊影片（travelogue）。當時在臺的日人或漢人要取得總督府所核發電影說明者（辯士）執照，則都要等到 1927 年之後。⁴

在日治時代臺籍的電影辯士，他們悠游在兩個想像界中，進而譯解影像與挪用文化，製造了讓觀眾認同的「我們的另一種電影」，在美學上是電影實踐的方式，更是追討話語權的策略，可以進一步作為臺灣電影起源的型態（史惟筑，2019，頁 133）。因此，這位泰雅族的女性亞越絲·伯列，在 1912 年之際，即已參與電影拍攝協作，並擔任電影進入部落放映的解說者，成為殖民者與被殖民的原民部落之間的中介者。在默片時代裡，電影放映時所空出的聲音空間（soundscape），最先被填補的是統治者的意志與影像的任務，其次是通譯者以族人可以理解語言型態加以轉述，最後是現場觀眾回應的情況。當這些影像經過原住民解說員以自己的語言解說之後，這些經過轉譯與再詮釋的電影意義，有時與統治者原本利用電影所欲傳達的政治意圖出現偏移的現象，而這樣的偏移即成為逃逸殖民統治與意識形態控制的縫隙。

肆、鎮壓原住民軍事行動的影像紀錄

在佐久間左馬太擔任總督時期，統治原住民的核心策略是鎮壓與滅絕，教化與威嚇的僅是輔助的措施而已。在佐久間第二個五年「理蕃」政策期間（1910-1915），殖民政府以龐大優勢的武力鎮壓北部的原住民族群。1910 年 5 月起總督府兵分三路，從宜蘭、新竹與桃園等

地圍剿泰雅族的雅奧罕社（ガオガン，Gaogan）。6月在宜蘭芴芴（ボンボン）山一帶遭遇到泰雅族頑強的抵抗與攻擊，戰況激烈膠著，總督甚至電令在糧食缺乏時，軍人可以原住民的人肉補充（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宋建和譯，1999，頁 45；松田京子，2014／周俊宇譯，2019，頁 198）。7月重整旗鼓，局面逐漸穩定下來，後來獲得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同仁社與高松豐次郎的協助，聘請來自大阪的土屋常治為攝影師，拍攝征伐現場的相關影片。由於拍攝時正逢臺灣暑熱高溫，這批從日本帶來的膠捲片基藥膜容易溶化流失，導致成像緊縮劣化的情形，在解決這些問題之後，總共拍攝六千尺的影片（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9月28日）。根據《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沿革誌》的記載，曾在7月12至23日，以及10月13日兩度派駐電影攝製人員拍攝軍隊與警察戰鬥的情形（大橋捨三郎，1941，頁 141／李享文譯，2000，頁 137）。

臺灣總督府征伐泰雅族雅奧罕社是第二個五年「理蕃」政策下，首先發動鎮壓原住民的戰役。而從當年《臺灣日日新報》10月份在全臺灣相關映演活動的報導，這場戰役留下了《臺北停車場出發光景》、《叭哩沙平原行軍》、《討伐隊活動》、《輸送隊困難》、《第二高地突擊》、《悲愴哉漆崎山》、《巨木伐採的特別作業班》、《第一守備隊司令部》、《警察隊前進》、《傷病者收容所治療實況》、《戰死者遺骨護送》、《雅奧罕蕃臺北觀光》等等相關紀實的影片（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0月6日）。這些影片曾於當年在總督與民政長官官邸試映，10月9日在臺北榮座連續放映三天，引起很大的注意，入場觀看有3221人次，後來陸續在國語學校、中學校、警官練習所放映，並透過高松豐次郎旗下的臺灣同仁社的映演網絡到全臺各地巡迴上映（大橋捨三郎，1941，頁 141／李享文譯，2000，頁 137）。這些影片亦曾經在1912年10、11月間在東京所舉辦的，爲了展示日本殖民地治理現況的拓殖博覽會上放映（拓殖博覽會，1913，頁 66；松田京子，2014／周俊宇譯，2019，頁 228-229）。1912年高松豐次郎回日本競選候補議員，曾將這些征伐原住民的影片放映給貴衆兩議院的議員與福島的鄉親觀賞，以宣揚其在臺灣的奮鬥與成就（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4月3日）。這些血腥鎮壓原住民軍事行動的影片，最終回到殖民宗主國，成爲這些人炫耀殖民地治理績效與「文明化」原住民的影像「勳章」。

1912年10月殖民政府征討新竹廳轄下泰雅族馬利克灣社（マリコワン，Marikowan，另譯馬里闊灣群），發動了隘勇線推進戰爭，經過高松豐次郎的引薦，招聘鶴淵幻燈店的中里德太郎擔任戰地攝影技師（田中純一郎，1975，頁159；李道明，2019，頁213、255），蕃務本署特地以囑託名義聘用，這位攝影技師在10月31日隨民政長官內田嘉吉、總指揮官大津麟平前進李崧山司令部，在砲陣地拍攝時，突遭到躲藏於深菁中的原住民射殺（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宋建和譯，1999，頁311）。戰事拍攝工作中輟，直到同年12月17日，補派宮崎民雄、土屋常德二人前往李崧山繼續拍攝（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12月20日），但是，此際征討的軍事活動已告一段落，部隊已解編，馬利克灣社並未歸順降伏，只是殖民政府的隘勇線更往泰雅族的山區推進。

這些鎮壓原住民影片的製作、發行與映演，背後有二個重要的單位在運作著：一是愛國婦人會，一是臺灣同仁社。臺灣的愛國婦人會創立於1904年，1905年合併各地的支部之後設立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當時支部長是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妻後藤和子，副長之一為當時警察本署長大島久滿次之妻大島富子，全臺各廳長為顧問，廳長之妻為幹事部長（大橋捨三郎，1941，頁22-23）。這個組織過去在鼓勵婦女放足、受教育的風氣受到社會的矚目，但是其依附在殖民政府的官吏權力結構之下，最後仍不免淪為男性執政者的附隨組織。在最初創立的前十年，正值總督府對原住民採取激烈的「理蕃」政策時期，成為高壓統治原住民的共謀者（竹中信子，1995／蔡龍保譯，2007，頁176-179）。從1941年出版的《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沿革誌》一書中顯示，在其創業時期，其所操辦的事項幾乎以臺灣原住民相關事業為核心，其中首務是原住民征伐部隊的慰問與救濟，另外在特殊經營項目上，包括「蕃」產品的交易，海內外原住民參展博覽會與共進會的活動，最後即是為了募集救護資金所進行的全臺電影巡迴映演活動。

愛國婦人會在全臺的電影巡映活動是委託高松豐次郎所主持的臺灣同仁社來進行。高松在1901年第一次到臺灣，即受到當時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的支助，得以進入阿里山地區拍攝影片。1906年3月嘉義發生梅山大地震，隨後高松發起義捐震災的電影放映活動（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4月17日），開啓在臺以慈善救護為名的電影映演活

動。在 1907 年拍攝《臺灣紹介》時，拍攝了當時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大島警視總長，更拍攝介紹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在臺運作的情形（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5 月 14 日）。1909 年 9 月愛國婦人會開始委辦同仁社全臺巡迴電影放映業務，這項業務有二大功能，一是慰問征伐原住民的軍警；二是募集官方無法支應的救護基金。同仁社辦理這項活動長達 7 年，直到 1915 年 11 月截止，為愛國婦人會帶來 43,955 圓的純益收入，而根據合約，同仁社也獲得相對的獲益收入（大橋捨三郎，1941，頁 139-144／李亨文譯，2000，頁 134-139）。

在日治初期殖民政府統治原住民的高壓行動中，愛國婦人會以婦女慈善救護為名，實際上對原住民所進行的是控制生存物資、剝削經濟利益，為鎮壓原住民的軍事行動提供經濟上與精神上的支援，而高松豐次郎及臺灣同仁社其所組織的電影製作與全臺發行映演網絡，不只提供愛國婦人會取得這樣的支援，更為日本殖民政府鎮壓原住民的軍事行動建構一整套的戰爭認知後勤系統。這一套殖民帝國戰爭認知後勤系統的建構，包括前線有以「討伐膺懲未開化」原住民為名的軍事行動，後方則有以慈善救護為名的愛國婦人會，以及披著對各種族一視同仁之外衣的「同仁社」，透過當時新奇的電影巡迴放映活動，除了可以勸募捐輸戰爭的經濟支援外，更可以透過這些戰鬥影片迷炫島民心智，藉以鼓吹原住民的「野蠻」，日軍作戰的慘烈狀態，營造日本與島內同「仇敵」愾的認知宣傳戰，藉以合法化殖民者其種族滅絕的意圖與行動。

因此，那些由總督府、婦人會與同仁社所製作的軍事征伐影片，絕非是戰場全面的觀點，其所呈現的僅是殖民政府願意讓人觀看的一面，或是這類電影用於認知後勤作戰的一部分而已。至於被鎮壓的對象，是如何遭遇到慘絕人寰的殺戮，在殖民政府高呼帝國的榮光聲中，在鼓吹文明進化的吶喊聲中，盡皆受到掩蓋消失。當光學影像伴隨著殖民帝國軍隊進入臺灣，充當政府的前鋒視野，即潛藏著觀看暴力，當觀看與殖民政府合體，觀看的暴力即是見證（陳傳興，2011，頁 6）。在殖民地歷史觀看機制中，特別是由官方所控制的電影製作與觀看機制，反抗的被殖民者他們奮力抗暴的行動是以一種貶抑的形式，或缺席的狀態被再現著，他們總是出現在戰敗與歸順的敘事脈絡中，而銀幕上充斥著壓迫者與殖民者在原住民的生存之地勝利歡呼的景象。

伍、結論

本研究試圖重新檢視日治初期相關的文獻與史料，期望從中拾掇過去臺灣電影史論述長期所忽視的，有關於原住民最初的電影文化經驗。而這個文化經驗最重要的是要彰顯電影這項新科技引入臺灣之際，原住民對於這項新媒體的使用與體驗，是整個臺灣電影歷史活動一部分。而且這個部分，正是在電影問世之初，開始流傳於全球各個角落之際，當這個媒體引入臺灣後，與臺灣原住民接觸所形構而成的電影文化經驗，這是臺灣電影歷史發展脈絡上，擺脫受到日本殖民電影體制的侷限，以及長期由華人（漢人）電影所建構的主流論述，進而重構出臺灣電影在歷史論述與文化界定上極為獨特的一部分。

日治初期，對日本來說，電影是剛從西方傳入的新奇事物，殖民者挪用這個外來的新奇媒體，轉身作為向原住民炫耀與威嚇的視覺奇觀，這是電影作為殖民地戰爭中認知後勤心戰武器的一部分。早在日本殖民之初，運用朝服、神社、總督府與官舍的外在形式來震懾臺灣人，後來利用觀光來讓原住民看到山外的世界，藉以顛覆他們原有的世界觀，而電影傳入之後，電影成為可以上山下海的替代性觀光，可以直接進入部落，把山外的「文明」影像投映在族人的眼前，電影更像一尊無形的大砲似的，逐格地摧毀原住民族的文化尊嚴與自信。因此，從臺灣原住民的角度來檢視日治初期的電影經驗，可以看到殖民政府對待不同原住民族的策略，對位在臺灣南方的鄒族，施以綏撫的措施，對於北臺灣的泰雅族則施以征伐的武力手段。然而，無論是綏撫或鎮壓的措施，此際電影所扮演不只是純然的媒體與娛樂形式，而是殖民戰爭中認知後勤的武器，更是殖民政府遂行文化清洗的工具。

綜觀日治時代臺灣電影的發展，電影的歷史論述應當不只是由日本人或漢人所建立起的戲院或零星的製片事業。在殖民的脈絡下，在電影甫傳入臺灣之初，原住民已透過在海外或境內的方式接觸到電影，諸如鄒族的矢多阿巴里，泰雅族的亞越絲·伯列。雖然這些人在當時位卑職輕，所能從事電影活動也是相當邊緣的，但是這些都是在殖民地的處境下，臺灣人可以接觸到的電影文化經驗。過去臺灣日治初期的電影史論述，大多圍繞在高松豐次郎、愛國婦人會與同仁社的電影

製作與映演的歷程所衍生的歷史書寫。然而，這些人、這些機構、這些歷程，究其實是依附在臺灣總督府征伐原住民的統治策略之下，是殖民地戰爭的認知後勤部隊，是日本帝國對臺灣原住民進行文化清洗的共謀者，這是未來重新檢視日治初期臺灣電影史時，必須特別謹記在心的。

最後，必須重申的是，史料來源關乎歷史的書寫與重構。重新審視本研究史料來源，大多來自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的官方公文書、紀錄、期刊、報紙，甚至日本人的相關研究。這些由殖民者所留下的文獻與紀錄，大多帶著殖民統治者、征服者、與種族優越教化者的角度記錄下來，這些紀錄裡的原住民被異化為「他者」，從字裡行間充斥著鄙夷輕蔑的敘述，看不到原住民的主體性。因此，從史料來源的比重上觀之，本研究僅是日治初期殖民政府官方記錄下的原住民電影經驗而已。期待未來後繼研究，可以從原住民族本身的田野調查、口述歷史、族人記憶等，進一步填補並豐厚日本殖民時代原住民族的電影文化經驗。

註釋

1. 阿巴里（アバリ），日文全名為，矢多阿巴里，鄒族原名 avai-e-yatauyogana，嘉義縣阿里山鄉特富野部落人，是阿里山鄒族青年接受日本教育的先驅，當時取得嘉義辨務署的簡易教育，後擔任達邦（日警）駐在所的工友，因協助日本平定布農族戰事獲擢升為日警巡查補，1918 年因炸魚誤傷身亡，其三子名為高一生，曾任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鄉長，致力於原住民自治運動，被捕槍決，成為白色恐怖下原住民受難者（王嵩山，2003，頁 74；楊維真編，2009，頁 36）。
2. 清朝時在文獻上稱原住民為「番」，日治時期則以「蕃」稱之，殆 1923 年裕仁太子行啓臺灣，將原住民轉稱為「高砂族」，但是這個稱呼直到 1930 年霧社事件之後始見通行。「番」、「蕃」或「高砂族」，這些稱呼皆有歧視之意，然而，本文為了避免混淆，並事實

呈現當時的文獻用語，故在陳述上與文獻上仍會沿用當時的稱呼，並無歧視與不敬之意，敬請諒察。

3.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在 1907 年 6 月 9 日，第 5 版的報導指出，這五位鄒族的原住民分別是：ノアツアチャナ、ラパスロング (Noatsuachana Lapasulongo, 18 歲)、ノアツアチャノウオング (Noatsuachana Uongo, 18 歲)；流勝社原住民ムキヤナ、パスヤ (Mukiyana Pasuya, 28 歲) 與其妻ニヤホササロング (Niyahosasa Longo, 25 歲)、無荖咽社原住民婦女ヤシユング、サロング (Yashijungo Salongo, 27 歲) (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6 月 9 日)。
4. 1927 年 2 月 25、26 日二天，臺北州舉辦首屆活動寫真說明者(辯士)測驗，25 日筆試，26 日口試，與試者日本人 16 位，臺灣人 3 位，當時臺北州有五家電影常設館 (臺灣警察時報，1927／洪雅文譯，2000，頁 191-192)。

參考書目

- 三澤眞美惠 (2002)。《殖民地下的「銀幕」：臺灣總督府電影政策之研究 (1895-1942)》。前衛出版社。
- 王嵩山 (2003)。《聚落經濟、國家政策與歷史：一個臺灣中部原住民族的例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巴蘇亞·博伊哲努 (2006)。《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石丸雅邦 (2017)。〈「蕃語講習」：日本時代代理蕃警察的臺灣原住民語言訓練〉，《原住民族文獻》，35：59-63。
- 石婉舜 (2010)。《搬演「臺灣」：日治時期臺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型構 (1895-1945)》。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論文。
- 石婉舜 (2012)。〈高松豐次郎與臺灣現代劇場的揭幕〉。《戲劇研究》，10：35-68。 <https://doi.org/10.6257/2012.10035>
- 史惟筑 (2019)。〈辯士何以成爲臺灣電影的「起源」？〉，李道明編《動態影像的足跡：早期臺灣與東亞電影史》，頁 129-141。臺北藝術大學、遠流出版公司。
- 李天鐸 (1997)。《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亞太。
- 李享文譯 (1993)。〈臺灣電影發達史稿〉，《電影欣賞》，65：109-117。(原書 市川彩 [1941]。《アジア映画の創造及建設》。國際映画通信社出版部。)
- 李享文譯 (2000)。〈臺灣愛國婦人會電影巡迴映演始末〉，李道明、張昌彥編，《紀錄臺灣：臺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 (上)》，頁 133-142。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原書 大橋捨三郎 [1941]。《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沿革誌》。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頁 136-145。)
- 李道明 (1994)。〈近一百年來臺灣電影及電視對臺灣原住民的呈現〉，《電影欣賞》，69：55-64。
- 李道明 (1995)。〈臺灣電影史第一章：1900-1915〉，《電影欣賞》，73：28-44。
- 李道明 (2000)。〈日本統治時期臺灣電影與政治關係〉，李道明、張昌彥編，《臺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 (上)》，頁 54-60。文化建設委員會。
- 李道明 (2019)。〈教化、宣傳與建立臺灣意象：1937 年以前日本殖民地政府電影運用分析〉。李道明編，《動態影像的足跡：早期臺灣與東亞電影史》，頁 201-277。臺北藝術大學、遠流出版公司。

- 吳其諺 (1993)。〈吳鳳神話背後的影像：原住民在政策片中的意義〉，《電影欣賞》，66：48-55。
- 宋建和譯 (1999)。《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誌稿：第二卷（下卷）》。臺灣文獻委員會。(原書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18]。《理蕃誌稿：第一、二編》。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 呂紹理 (2011)。《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二版)。麥田。
- 呂訴上 (1961)。《臺灣電影戲劇史》。銀華。
- 杜維運 (1997)。《史學方法論》。三民書局。
- 何曉芙譯 (2018)。《國族音影：書寫臺灣電影史》。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原書 Hong, G. J. [2011]. *Taiwan cinema: A contested nation on screen*. Palgrave MacMillan.)
- 周俊宇譯 (2019)。《帝國的思考：日本帝國對臺灣原住民的知識支配》。衛城出版／遠足文化。(原書 松田京子 [2014]。《帝国の思考：日本[帝国]と台湾原住民》。有志舎)
- 周窈窕 (2003)。〈「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周邊波瀾〉，周窈窕編，《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 13-31。允晨文化。
- 洪雅文譯 (2000)。〈臺北州活動寫真說明者測驗〉，李道明編 (2000)《紀錄臺灣：臺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上）》，頁 191-192。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原書 《臺灣警察時報》，1927 年 4 月，118：188-189。)
- 高英傑 (2018)。《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玉山社。
- 徐國章譯 (2005)。《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 中譯本 I》。臺灣文獻館。(原書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3]。《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 陳金田譯 (1997)。《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誌稿（第一卷）》。臺灣文獻委員會。(原書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18]。《理蕃誌稿：第一、二編》。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 陳傳興 (2011)。《銀鹽熱》。行人文化實驗室。
- 莊振榮、莊芳玲譯 (2014)。《臺北州理蕃誌：舊宜蘭廳（參）》。宜蘭縣史館暨原住民委員會。(原書 臺北州警務部 [1923]。《臺北州理蕃誌》。臺北州警務部。)
- 黃仁、王唯編 (2004)。《臺灣電影百年史話》。中華影評人協會。
- 黃英哲譯 (2013)。《臺灣總督府》。前衛出版社。(原書 黃昭堂 [1981]。《台湾総督府》。教育社。)
- 曾淑卿譯 (2007)。《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大正篇 1912-

- 1925)》。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原書 竹中信子 [1995] .《植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田畑書店。)
- 堯嘉寧譯(2020)《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原書 Barclay, P. D. [2017]. *Outcasts of empire: Japan's rule on Taiwan's "savage border," 1874-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楊維真編 (2009)《嘉義縣志·人物誌》。嘉義縣政府。
- 葉龍彥 (1996)《新竹市電影史 (1900-1995)》。新竹市文化中心。
- 葉龍彥 (1998)《日治時期臺灣電影史》。玉山社。
- 鄭政誠 (2005)《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博揚文化。
- 鄭樑生編 (2002)《史學方法》。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臺灣協會會報 (1900年8月20日)〈蕃人觀光〉，《臺灣協會會報》，23：69。
- 潘國正編 (1996)《風城影話：新竹市電影、戲院大事圖錄》。新竹市文化中心。
- 厲復平 (2017)《府城·影戲·寫真：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獨立作家。
- 蔡龍保譯 (2007)《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 (明治篇 1985-1911)》。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原書 竹中信子 [1995] .《植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田畑書店。)
- 藤井志津枝 (2001)《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 (三)》。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羅維明 (1993)〈日治臺灣電影資料出土新況〉，《電影欣賞》，65：120-121。
- 羅頗誠 (1994)〈沙鷺之鐘的殖民情境〉，《電影欣賞》，69：44-47。
- 〈蕃地の活動寫真〉 (1913年3月15日)《蕃界》，2：137。
http://stfj.nt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pjournal&s=id=%22jpli2007-pd-sxt_0705_47_n002-035_no30_j%22.&searchmode=basic
- 大園市藏 (1916)《臺灣人物誌》。谷澤書店。
- 大橋捨三郎 (1941)《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沿革誌》。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
- 古川松舟、小林小太郎 (1915)《蕃界平定紀念：臺灣開發誌》。臺北印刷株式會社。
- 市川彩 (1941)《アジア映画の創造及建設》。國際映画通信社出版部。
- 田中純一郎 (1975)《日本映画発達史 I》(1993年3版)。中央公論社。

- 拓殖博覧会編（1913）。《拓殖博覧会事務報告》。拓殖博覧会残務取扱所。
取自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46267>。
- 臺北州警務部（1923）。《臺北州理蕃誌》。臺北州警務部。
- 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9月8日）。〈十字館の活動寫眞〉，《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
- 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9月9日）。〈廣告〉，《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7月19日）。〈生蕃人の内地行〉，《臺灣日日新報》，第2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1月16日）。〈觀光蕃人の演説〉，《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2月28日）。〈生蕃の内地觀光所感（二）〉，《臺灣日日新報》，第2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0月23日）。〈激戰活動寫眞會〉，《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1月21日）。〈活動幻燈〉，《臺灣日日新報》，4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2月4日）。〈歸順落の下山〉，《臺灣日日新報》，第2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4月17日）。〈震災義捐之活動寫眞〉，《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5月5日）。〈臺灣紹介活動寫眞蕃界の撮影〉，《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5月14日）。〈臺灣紹介活動寫眞（承前）愛國婦人會〉，《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6月9日）。〈臺灣紹介活動寫眞内地に赴く〉，《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6月13日）。〈不思議の影（蕃人の活動寫眞見物）〉，《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9月28日）。〈討蕃活動寫眞〉，《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0月6日）。〈討蕃實況活動寫眞會〉，《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4月3日）。〈前進隊活動寫眞〉，《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7月26日）。〈内地觀光蕃活動寫眞〉，《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7月27日）。〈觀光蕃の活動寫眞〉，《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
- 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12月20日）。〈同仁社之蕃地寫眞〉，《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
- 臺灣總督府（1901年1月1日）。〈阿里山蕃出身學生「アバリ」觀光日誌嘉義辨務署送付〉，《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00004647001。國史館臺灣文獻館。<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3482662huTTOW#NYB6>
- 臺灣總督府（1912年12月1日）。〈囑託ヤジツベリヤ（賞與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00002074068。國史館臺灣文獻館。<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576629IZgB=ly#cuV9>
- 臺灣總督府（1915年9月1日）。〈元雇ヤジツベリヤ（賞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00002466018。國史館臺灣文獻館。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576485QkR=uT_#2Jr8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理蕃誌稿：第一、二編》。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取自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44262>
- Baskett, M. (2008). *The attractive empire: Transnational film culture in imperial Japa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Davidson, L. (2012). *Cultural genocid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Griffiths, A. (2002). *Wondrous difference: Cinema, anthropology, and turn-of-the-century visual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unning, T. (2006). The cinema of attraction[s]: Early film, its spectator and the avant-garde. In W. Strauven (Ed.), *The cinema of attractions reloaded* (pp. 381-388).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Pisters, P. (2010).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2.0: Multiple screen aesthetics in Iraq War films. *Film-Philosophy*, 14(1), 232-252. <http://www.film-philosophy.com/index.php/fp/article/view/221/179>
- Sand, J. (2014). Imperial Tokyo as a contact zone: The metropolitan tours of Taiwanese aborigines, 1897-1941.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12(10), 1-11. <https://apjff.org/-Jordan-Sand/4089/article.pdf>
- Shohat, E., & Stam, R. (1994). *Unthinking Eurocentr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 Routledge.
- Virilio, P. (1984/1989). *War and cinema: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P. Camiller, Trans.). Verso.

Ziomek, K. L. (2015). The possibility of liminal colonial subjecthood: Yayutz Bleyh and the search for subaltern histories in the Japanese Empire.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7(1), 123-150. <https://doi.org/10.1080/14672715.2015.1004826>